

由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朝阳门附近的车站进城去参加游行。二年级暑假的教学实习地在官厅水库工地，我们两个班约60名学生及教师和后勤人员就是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经京张线去官厅水库的。我们班的同学有一段轶闻与这条铁路线有关。我们班的两个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一天下午，他们信步出了南校门，漫步到铁路线上，然后就沿着铁路线散步。突然间，他们发现一辆火车停在了他们身后，司机下车问

他们为什么不躲避火车。原来，火车司机在很远处已经发现了有人在铁路上走，一再鸣笛，谁知这两人居然没有听到。好在司机及时停车避免了一场事故。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司机请他们两位乘这辆火车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经过车站人员的询问，并与学校有关方面联系，知道他们都是好学生，就把他们“放”了。

（节选自周志德《清华杂忆》，题目为编者所加）

1958潮河之冬

——写于水利系首建工地设代组55周年

○丁 照（1958水利）

一个时代镜头，一段水利系往事，一场同学情和战友情！

在人生将近80个春秋中，你要问哪一年对你印象最深，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1958年的冬天。那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便是“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当时共有三大水利项目等待学生去做，密云水库、三家店水库和张坊水库。实际上，落实下来的只有密云和三家店两处。两个工程的初设虽都做了，但后来真正施工的则只有密云水库。这是一座具有多种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在北京市密云县境内的白河与潮河两条河上（在顺义汇集为一条潮白河），各建主坝一座，高水位时，便汇集成一座水库。此外还有许多副坝及其他混凝土建筑物等。这座华北最大的建设项

目，本是列入未来的五年计划，1958年提前上马，所以，时间紧迫，特别是位于首都上游，更要求万无一失，绝对安全。

当时全国是一片跃进声，在这个大背景下，学校执行的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而我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还未等完全毕业便接到通知说，立即到密云水库工地参加设计代表组工作。于是，1958年9月7日，我和另外三人，坐上一辆从市里派来的苏制嘎斯拖斗吉普车，带上铺盖卷，匆匆来到水库工地。这便是水利系在工地建立设计代表组的最初萌芽。

那是由席棚搭建的四合院式指挥部，位于库区内的一片开阔地上，旁边就是宽阔的潮河。总指挥是王宪同志，大概也就30岁，他原是通州专区的一把手，调来工地全权负责（后来是市委农村工作部书

□ 母校纪事

记)。不久,整个指挥部一分为二,大部人马进驻库区外的白河工地成为总指挥部,少数人进驻潮河。我与另外几人留在潮河。我们一开始,设计和住宿都在老乡的砖瓦房中,进入深秋,设计工作便全部搬入由竹板墙搭建的工棚内,开始了漫长的冬季生活。

先简单说一下施工的整体场面。潮白河工地从东到西长约40公里,总土石方量大约3600万立方米。施工采用半机械半人工的方式。小火车、皮带机、推土机、拖拉机、载重车、搅拌机等负担了大部分工作量,但机械能力以外的大量工作则全靠人力。当时聚集了北京郊区和河北各受益县民工十几万人,高峰时曾达到20万。一个县是一个支队,下面一律按连、排、班的方式组织。民工自带行李,没有工作服,住的是工棚大通铺。每天两大班,不包括路上时间,没有周日。指挥部还时不时组织所谓“放卫星”。全工地正常筑坝的沙土量为每日六七万立方米,“放卫星”时要达到20乃至30万立方米。民工只能连轴转。夏天酷暑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再加上疲劳困倦,饮食简单,蚊虫叮扰,其艰苦程度今天很难想象。所以,工地上总是昼夜人山人海,热火朝天。我们设代组就是在这样一个跃进的形势中,开展自己工作的。设代组的精神气氛完全融入工地之中,艰苦紧张,而且还要比施工超前。每天的工作,看似不同,但又大体相同。

早上大家拿着各自的脸盆和牙具,来到四周尽是冰坨的压水井旁,接上一盆冰冷的水,洗漱和早餐毕,便开始了一天的战斗。棚内温度很低,人人身披从里借来的黑色棉大衣,操作不便不说,墨汁也

容易凝固,造成鸭嘴笔不畅,绘图困难。除设计外,大家还要经常跑工地,主要是图纸交底、技术讨论、质量问题的处理等。现场离设计组一般五六公里,大家身披“重甲”,来回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往往是大冬天一身汗,小风一吹,透心凉。年轻人最喜欢睡觉,可那时每天也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晚饭后总要念一会儿报纸,实际上,谁也抗不住一天的困倦,听着听着就都睡着了。而这也是歪打正着,打个小盹儿,精神更好。然后,开始夜战,每天都干到深夜一两点,组长发话后,大家才开始收拾东西回屋休息。那是典型的北方农舍,两边两间是炕,中间一间是柴灶。一个通铺睡三四个人,下面铺的是苇子席,冰冷异常。按说,如果当时每天有两人提前回去,烧点开水,顺便也烧热了炕,并不费事。但似乎谁也没想到这一点,就这样硬挺了一冬天。

其实,我们回忆的并非完全是那年月的劳累与严寒,印象更深的则是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那段同学情。

政治挂帅是当时的最强音,事事要从政治角度上去观察对待,要求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这种大环境下,白河设计代表组作为全系的主力所在地,批判气氛非常紧张,人人担心不知何时会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随便说个小例子,你有技术问题去请教工程师,那别人就会说,为什么不请教工人师傅?就可能被批为“专家路线”。反正各种帽子很多,弄得人有些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说人者自认为是觉悟高,被说者也只能默认,否则,越辩越糟。当然,这些批判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也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而潮河

设代组则相对温和得多。这一点多亏组长刘婉珍同学。她是1958届的学生党员，虽比我们大两岁，但也是年轻人，为人和蔼稳重，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设计工作、重大的技术责任、高压的政治气氛，她作为潮河设代组的政治负责人，既要对上又要对下，着急起来，发点脾气，上纲上线，是可以理解的，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她总是一副亲切面孔，遇事不慌，很有胸怀。在她的主持下，潮河的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和谐有序，一直没出什么大的差错。今天设身处地想一下，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她能做到这一点，她自己究竟承担了多少，化解了多少，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小青年，当然谁也不曾考虑，可能也就是她自己知道吧！

下面的照片是潮河设代组的主要成员，拍摄于1959年3月28日的潮河主坝下。



先说说照片后排：后排右二短发者就是我们的好组长、好同学刘婉珍，一位冷静和蔼大度的共产党员，人们亲切称她为“大姐”。设代组结束后留任水利系，已经病逝。右一是好同学王清友，一名创意的设计者，潮河主坝设计的首席代表，现为水利系退休教授，著作颇丰。左一是

好同学李步群，有长者风度，后去武汉。左二的姑娘是低一班的同学，我的好战友王正容，我们共同设计进水塔及其附属设施。手工计算工作量很大，算稿成摞，数字成堆，旁边有位细心姑娘校核该是多么叫人放心啊。她现在上海，已退休。

再说说前排：左蹲者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李允申，认真而幽默，全盘负责副坝设计，工地很远，经常来回跑，我们在一起直到70年代。他后去郑州，已病逝。中蹲者是苏联留学生基比丘，在潮河实习了几天，由我给他讲解，年轻人很快便熟悉起来。他总随身带着一台36张的苏制照相机，这张照片可能就是用那台相机拍的，然后放大，送给我们留念。他的中文还可以，出于好奇，我还问他一些苏联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右蹲者就是本人，1959年9月10日，我和李允申一起回到系里接受新任务。一年多后，我又同他一起，随组织机构变动而离开学校，30多年后，从国家开发银行退休。2007年至2012年，我又回到母校开课，不过已不是水利系，而是面向全校各系的同学。2013年由于健康原因，将讲课改为讲座。我很喜欢学生，我们堂上互动，他们的兴趣和表情，也深深鼓舞了我，极大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整整55年过去了，一切犹如昨日。现在，除了基比丘无从知晓外，照片上的6人已逝去2人。那段特殊的年代，以及在那个年代下所显示出来的人情，是多么朴实，多么纯真。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另眼看待，也没有相互猜忌。这个镜头，这段往事和那时彼此间的真挚友情，非常值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品味。

2013年7月29日